

罗以澄 自选集

新闻求索录

新闻
传
播
学
名
家
自
选
本

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

罗以澄自选集

新闻求索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以澄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罗以澄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

(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

ISBN 7-309-04122-4

I. 罗… II. 罗… III. 新闻学-文集 IV. 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847 号

罗以澄自选集——新闻求索录

罗以澄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顾 潜 黄文杰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5.75 插页 3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书 号 ISBN 7-309-04122-4/G·543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罗以信

罗以澄学术档案

罗以澄，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出生，祖籍福建福州，从小在上海学习、生活。60年代初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6年毕业后，长期担任地方报纸和广播媒介的记者、编辑工作；1984年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现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海德传播研究院院长，是该校新闻传播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和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主要负责人；同时，还担任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特约编委、武汉地区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以及多所高校的新闻学兼职教授和地方媒体的顾问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罗以澄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新闻传播实务和媒介发展，先后撰写(或主编)、出版《新闻采访教程》(1990年)、《新闻采访学新论》(2000年)、《新闻采访学新论(修订本)》(2002年)、《新闻写作现代化探析》(1989年)、《广播消息选评》(1985年)、《广播通讯赏析》(1986年)、《应用新闻学600题》(1996年)等学术专著、教材或教学参考书7部，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荣获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和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新闻论著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罗以澄教授从1984年开始，先后为校内外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过《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广播电视》、《名记者研究》、《新闻报道专题研究》、《现代新闻传播实务研究》等课程。从1988年开始，先后指导、培养15届51名新闻学专业硕士生和5届16名新闻传播实务研究方向博士生。2003年获得湖北省“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序

新闻传播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门类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传播学引起关注和广泛研究,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由于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从无到有,由附属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变成了独立门户的一级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新闻学理论、新闻史、新闻法治、新闻职业道德、广播电视与舆论监督的研究,全面铺开。新闻理论的研究也由纯党报理论的研究,扩展到一般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的研究,则外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相渗透,内与新闻学相融合,也有了很大发展。传播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以及传播舆论学、符号学的研究等,都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传媒的研究、媒介经济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新闻传

播学已经进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多角度学术发展的阶段”。

中国新闻传播学今天的繁荣发展,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薪火相承,代有传人,各领风骚若干年。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堪称名家,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纳入这一系列“自选本”的作者们,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新一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他们大多来自高校或其他教学研究岗位,都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界某一个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术业有专攻,腹笥丰硕,蜚声于时的新闻传播学界的佼佼者。和他们的前辈们比较起来,他们这一代的“名家”们具有以下的特点,即:一、具有较深厚的人文理论根底;二、具有较合理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三、具备必要的学科前沿知识;四、思想活跃,不刻舟求剑,不作茧自缚;五、接受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接受过中西文化交融的浸润,具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是开拓创新的一代,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代。

让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们出“自选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创意。首先,都出自“名家”。既是“名家”,就有了一定的质量上的保证,避免了在数量众多的新出的各类专著中,挑花了眼或挑走了眼。其次,都出自“自选”。既是“自选”,选出来的,必然是个人满意的自认为可以传世的精品。不会灾梨祸枣,不会误人子弟,也可以大大减少读者和学子们的经济负担。这对社会,对学术,对文化的发展,都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我祝贺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的问世,并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海内外新闻传播学者和学子们的关注和欢迎。

罗以澄

2004年2月19日于北京宜园

主编絮语

1

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有学界巨擘方汉奇教授赐序,不必主编赘言。这里仅就创意初衷、入选条件及编辑原则等说几句话。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革”逝去不久,曾经主张“新闻无学”的代表人物检讨了自己的无知。首都新闻学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先后问世。在这良好氛围中,中断许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又得以重新展开。新旧世纪之交时刻,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以百计,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千计。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

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日益深化与二、三级学科不断延伸,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学术领军人物应运而生。他们中间有王中、甘惜分、李龙牧、方汉奇、张隆栋、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一批学界元老。他们是新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开创者、拓荒者。他们有的提出了崭新的理论体系,有的著作等身,有的

向国人较早介绍新的新闻传播学说,有的以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学科建设……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新一代脱颖而出。新一代领军人物是在改革开放洪流中诞生的,他们在继承老一代学者理论、学识、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本辑自选本的八位作者是其中的首批代表。

编辑出版新闻传播学名家学术论文自选本,有这样几方面的需要。一是检阅新一代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研究成果,展示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业已达到的新水平。二是系统介绍新闻传播学研究新的领军人物的研究领域及其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沟通与互补。三是为新闻传播学年轻学子了解自己导师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平台。由于各种原因,刊载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的刊物既少又分散,阅读这些论文有相当困难。

对于被邀入选自选本的名家,总体上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他们一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某一专业或某一研究方向的领军人物,二是有一定的全国影响,三是在岗博士生导师,四是他们有着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鉴于符合这几条的学者全国有几十位之多,我们编辑此类自选本又无经验,计划先出第一辑,首邀八位名家入选。

既然是自选本,当然应尽显个人风格。但作为丛书,又需要有相近或相同之处。经八位作者商定,作为组成丛书的各自选本共同遵循这样几个要求:一是尊重历史原貌,对入选文章原则上不作更动,仅限改正错别字等一些技术处理。二是内容安排上每本有一帧作者照片,一段学术档案,一篇访谈录一类的文字,作者谈自己治学的经验、心得、体会。三是每本掌握在30万至35万字左右。

最后,作为主编,我要代表入选的八位作者,向我们的导师表示敬意,没有他们的栽培,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向我们的学生表示问候,正是他们的勤奋努力,成长成才,才显示出我们劳动

的价值。向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表示感谢,由于他们所提供的园地和机遇,我们这群书生才得以出版自选本,对自己走过的路程进行一番检视和反思。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读者对于这套丛书的批评。我们将根据读者的意见使这套丛书的未来几辑更臻完善。

童 兵

二〇〇四年春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追寻现代新闻传媒的 发展之道(代序)

如果你想读懂中国新时期新闻传媒发展的历史,那么,你必须去读懂那真实地游弋在这历史河流中的新闻人和学者。罗以澄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你去读解的学者。

1978年的“思想解放风暴”席卷中国之时,罗以澄还只是一位为不得不写违心的宣传表扬稿而苦恼的记者,一位受过大学新闻学术训练而不得不以意识形态话语思维的“新闻思想的失踪者”。自那以后,中国的新闻改革悄然启动,和大多数新闻人一样,罗以澄终于有机会恢复自己的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勇气,以社会良知代表的心态去推进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然而,他发现,缓慢变化着的新闻界并不能满足他的这一精神需要,于是,他决定选择做学者,并在1984年以不惑之年走进了武汉大学新闻学系。从此,这位“新闻思想的失踪者”回到新闻学术队伍中来,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学术与教育园地,非常惬意地自称为新闻传播学的“耕耘者”。

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等旧的意识形态从历史的地平线上

逐渐淡化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新闻人已拥有了新的意识形态:新闻业的现代化,一些人以启蒙者的姿态追寻着其中的真实意义,向传统新闻传播观念发起了顽强的冲击。罗以澄在1984—1988年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展开的。

罗以澄当时所做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辨析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新闻价值、新闻的客观性等基本概念,恢复对新闻本体的认识,恢复对新闻的信息功能的认识,进而回归到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二是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探寻新闻业务的现代化之路,建构具有科学、理论内涵的新闻写作学体系,拓展新闻业务研究的思维空间;三是恢复受众的主体地位,从心理学层面把握其特点,实现传者与受众的互动式传播;四是破解新闻报道的公式化、概念化等清规戒律,在理性、情感、想象、观察、报道方式等广泛层面恢复新闻报道的自由本性。这四个方面的探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化,而总的思维指向则是颠覆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乃至形式主义,呼唤新闻传播的理性意识。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理论表述直指新闻体制变革的滞后,直指“左”的新闻观念的荒谬;同时,你又看到,他的理论表述不是“宣战”式的,而是“建设”式的,即注意把握新闻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框架内消除两者的内在紧张关系,寻求新闻传播机制与其他社会机制的调适,实现新闻传播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良性互动。于是,你读到了那一代新闻人的心之所系与心之所惧,一方面,他通过对新闻本体的认识,确立新闻传播的理性意识和主体意识,通过新闻的信息功能的认知,建构作为公共论坛的新闻传媒,通过拓展新闻思维空间,消解新闻传播不自由的状况,通过阐述受众的主体地位,恢复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现代意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罗以澄那一代人魂牵梦萦的“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刚刚抖落历史的尘土,对动荡、暴力及思想控制还心有余悸,他不想以惊世骇俗的“宣战”式理论引发

革命的动荡和动荡的革命,成就“骑士”般的荣耀,他更关注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和实际效果,强调新闻理论要干预中国的新闻改革,要介入新闻传媒的发展过程,于是,你可以发现,在他的“刚性”理论观点背后也有着“柔性”的表述,诸如“在新闻传播中既要十分注意尊重新闻的自身规律,又要注意掌握宣传的规律和艺术,还得注意对舆论的考察与反馈,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水平,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的总体效果”(《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结合上下文,你可以理解其真实用意还是在于导入对新闻本体的认知。无疑,在这里,科学的理论表述融入了一些与某种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妥协”的技巧,这种技巧斫伤了理论的逻辑,但成全了一个现代化新闻观念的导入。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另一种忍辱负重的方式吧。

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知识界、新闻界又进入到一个思想困顿期,罗以澄也随之远离了新闻传播学论坛,以“守先待后”之心编撰着教材,整理着自己的新闻教育理论,悄悄地得到了两个收获:一是出版了一本体系新、内容全、视野开阔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在全国首次以“认识”为基点、以“方法”为重点建构了新闻采访学的全新体系,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等方法,开拓了新闻采访学的思维空间。一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闻教育思想,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能够改变中国新闻事业的命运,也能改变中国新闻传播者的命运,应该努力把新闻传播教育植入到现代大学教育的生命里,让新闻传播教育深深植根于人类对现代传播的需要与理解之中;新闻传播教育要合乎人类实践理性而存在,不仅要符合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理性,而且要合乎社会文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性,维护新闻传播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文品质。这一抽象的道理蕴涵着我们的具体实践,即承续现代大学精神,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按现代大学精神所内蕴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求知精神

去完善新闻传播教育,把专业教育变革为通识教育,在知识层面实现科际整合,从根本上适应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变化与知识创新要求,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精神;同时,综合性地开发学生在身心活动层面、政治社会层面、美感经验层面、人伦道德层面和批判精神层面的价值认识,从而使新闻传播教育形成一个新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思考,使他切入到了中国新闻传媒发展的人才战略层面,从而为他孜孜以求的“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之道”增添了新的内容。

1992年邓小平出人意外的南方谈话,使得中国的政治气候、文化气候、社会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重新启动,并走上“快车道”,媒介产业化、集团化、网络化,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左”的思想所设置的新闻研究“禁区”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闻观念已与当代新闻改革和全球化新闻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这时,罗以澄开始重新亲近学术论坛,主要围绕中国传媒发展问题展开了四个方面的探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报道的理念;二是市场经济与媒介市场的走向、传媒业资本运营的产权分析、传媒集团化问题研究、新闻生产的精品战略研究、党报的困境与对策研究等;三是网络传媒研究;四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与第一阶段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些理论表述不再停留于启蒙,而是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过程,不再是概念辨析,而是媒介发展思路探讨,不再局限于新闻报道,而是扩展到媒介经营与管理,不再只关注中国媒体,而是把中国传媒的发展纳入到跨国跨文化传播背景中考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理论思维宗旨,那就是“让媒介发展的理性贯通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无疑,这是对一代人所追寻的“现代新闻传媒发展之道”的丰富与提升。

思维的转换,带来的是更灵动、透彻的理性分析,如“媒介商业化运作的举措,并不意味着也不应导致信息产品的商业化,

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媒介属性与功能的异化”；“媒介的平民化趋势，是媒介‘人本’意识的觉醒，它不应也不会造成社会精英文化的失落”；“媒介商业化运作最根本的市场资源，不在媒介生产、传播的信息本身，而在于这个过程中创造的巨大的受众市场，不是媒介的时段、版面承载的信息本身具有商业价值，而是媒介的时段、版面所拥有的受众生产具有商业价值。媒介唯有通过向受众提供最佳的信息产品和最优化的服务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从而扩展自己的市场份额”；“传媒业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就需要设计出合理的传媒业产权制度”。如果仔细体验，你可以发现，理性、市场化、信息化、人文化、全球化等成了他所有理论表述的关键词，并构成了“现代新闻传媒发展之道”的重要内涵，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新闻传媒发展的精神内核。

从上述意义上讲，罗以澄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新闻传播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现实的一个重要链接点，它充分表现着时代与个人、创造与保守、科学与人文、批判与建设的多元化特点，同时，其率真、朴素的学术话语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真实。

在改革开放以前，罗以澄面对着一个把理论奉若神明的时代，人在不知不觉中把理论简化到意识形态的水平，制造着理论的神话，把现实生活交给理论去判断、操纵和想象，从而导致中国人的理性能力的退化。他和他那一代新闻学者在80年代所做的新闻传播研究实际上是恢复了新闻人的理性意识，打破了党报理论的神话。在他的眼里，任何理论若被视为绝对圆满和崇拜偶像，那它本身就成了失去生命力的、封闭的体系，人的生活也要被理论所宰制。因此，他大力提倡新闻传播理论的多元化、现代化、生活化以及创造性，强调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要具备理论创造的神圣使命感，在干预现实的过程中获得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完善人格的精神气质。如今，他的这一精神已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

21 世纪,罗以澄教授日渐圆融,白首松云,更有新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你继续关注、继续读解的可爱的新闻传播学者。

是为代序。

单 波
癸未夏于珞珈山

目 录

序 方汉奇/1

主编絮语 童 兵/1

追寻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之道(代序) 单 波/1

· 访谈录 · 罗以澄:在时空中探寻新闻 /1

重提新闻价值(1984 年)/16

——参加湖北省 1984 年上半年优秀广播新闻稿评选有感

广播听众心理研究琐谈(1984 年)/21

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共鸣点(1985 年)/30

新闻的理论色彩刍议(1986 年)/39

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1986 年)/52

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现状的反思(1986 年)/57

新闻写作学研究系统与科学方法的引进(1986 年)/64

新闻写作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思考(1987 年)/76